

戰訊 新思潮

合刊

戰訊第十二期
新思潮第十四期
一九八〇年八月

思想評論



時事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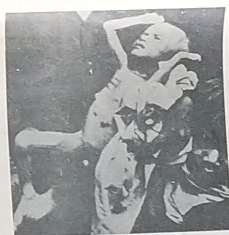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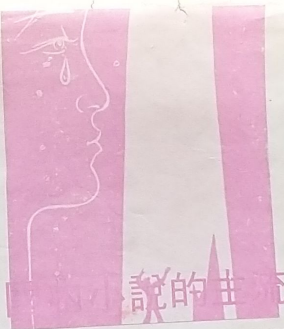
訪

托洛次基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綠皮書：
香港地方行
的模式

香港政府
代表誰？



柬埔寨難民營



倫常慘劇是一面鏡子

戰訊 / 新思潮聯合編輯委員會出版 · 地址：紅磡庇利街九號八樓 · 電話：3-658857 定價：二元

路進七九年以後，中國文藝界異常的活躍，不單官辦的文藝雜誌出現了不少優秀的，備受關注的小說、詩歌和劇本創作。在民間刊物裏，不少新芽嫩葉也茁壯地冒出來。這些作品的基本特色，是集中反映存在於社會各個領域裡的官僚特權問題。與打倒四人幫後而興起的「傷痕文學」相比，無論從內容深度和技巧上都向前躍進了一大步。

「傷痕」文學所揭示的痼疾是四人幫一伙的醜惡面目，中國人民的苦難大多簡單地形容是十年浩劫所遺留下的痛楚。作者筆下的正面人物往往是文革時被打倒的老幹部、知識份子，或者是敢於與四人幫鬥爭對老幹部的周際派幹部，反面人物則往往是文筆奸惡、令人切齒痛恨的四人幫悍將。故事的結局依然脫不了那些框框條條，可以引「傷痕」為例：女主角心懷著「我一定會繼承主席的遺志，緊跟著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畢生的力量」的誓詞，「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無論主角是走向南京路（「傷痕」）或是走向重慶路（「靈魂的搏斗」），類似的佈局和意圖都可以在同期的小說中找到。

「傷痕」文學所以能夠一度掀起廣泛的關注，是因為它首次揭示了四人幫統治下人民的創痛，也觸到了過去文藝界的禁區——例如愛情。人的面貌也更有血有肉和多样化地呈現出來，而不是振臂高呼，出口罵列的「無產階級的英雄形象」。但，僅僅藉著傷痕遠遠不能表現整個社會真實的全部，舊的傷痕還沒有復元，新的社會問題却已產生出來了。現今文學作品的主流，是建立在官僚階級和人民的矛盾上。

近期的文藝創作都以官僚作為描寫的核心。俗句論作者將之寫成窮兇極惡的高幹首長，還是身不由己、無力反抗的中下幹部。所作所為是禍國殃民，還是侷限於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官僚成為每篇小說的主題是因為在現實的中國裡，官僚的勢力是無所不在，無論在城鄉、廠房公社裡都出現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他們攻佔公館，中飽私囊，對這富有的階級進行野蠻剝削和摧殘，和官老爺作品的廣度和普遍性。文藝作為現實生活的反映，便將官僚的社會面貌，經過藝術的加工呈現出來了。

文藝創作並不是社會學的文獻，我們不應將小說當作剖析過渡時期中國社會的參考資料，同樣地，文藝也並不同於政治論文，所以我們不能要求也不應奢望文藝創作必需對社會現象有科學的分析，或者指出一條正確的政治方向。作家不同的人人生觀與個人經驗的局限，都往往未能與政治家的觀點謀取一致。但，優秀的文學作品必須正確地反映出社會的客觀真實，能夠捕捉到這個時期社會裡最具典型的矛盾和人物性格。所以不啻巴爾札哈是個保皇黨，不管他如何輕視上升中的資產階級，但在他筆下十九世紀的貴族却是走向末落窮途。農民革命這詞兒也從未進入曹雪芹的腦子裡，但透過一個貴族家族的興衰，作者成功地向讀者展示了封建社會家庭關係的千窟百孔。所以，我們將同期中國文藝小說裡的共通性概括出來，是可使我們更生動地看到目前中國社會的精神面貌。

透過各式各樣對官僚不同的描寫中，讀者可以得到第一個印象是：官僚貌似全能，在他們的職權範圍內可以說是為所欲為，一般老百姓祇有敢怒而不敢言。官僚與官僚之間不單官官相護，而且藉著最落後的血緣關係、裙帶關係和交情有機地聯繫起來。他們的精神面貌基本上是保守，苟且偷安和眼光狹窄。官僚們無論在利益上，思想上和生活上都是一個與人民對立的階層。

官僚全能的力量在那兒呢？一句話：有權便有一切。根據職位大小來分配不同的特權和享受。在「假如我是真的」一劇裡，作者藉著海東農場的農場長道出了痛苦的事實：「權利、權利、有權就有利，這就是有些人的真理，而且是經過實踐檢驗過的」。在其他的小說裡，這個「真理」是不斷地補充著、豐富著。

在「社會的檔案裡」和「飛天」這兩篇小說中，那側面描寫了高幹的奢華生活。前者的中央首長住在海濱漂亮的別墅裡，有私人保健護士照料。後者的副政委出入高幹招待所，看內部電影，當女主角飛天未婚懷孕而想去墮胎，却過不了醫院關手這一關時，他一個電話便完事了。作者更諷刺地描寫了首長級人

國內小說流行的題材：

新官場現形記

夏楚

物與百姓享受上的差異：「這個溫室辦公室，是個工人療養院，不過療養院中還有療養院，小橋流水深處另有一番天地，精緻的白牆、紅色的地毯……」。兩篇小說裡的部長都強奪了他們的保健護士，而受害少女祇能提出復員回家作為抗議，忍氣吞聲地讓歹徒逍遙法外。最可恨的是吳兆本身並不以為是罪行，更以官僚的邏輯為自己辯護。書記委覺得「如果不是打出新中國，像飛天這樣的使官姑娘那還不是任人擺佈」，於是「他覺得他應當得到這些東西（飛天的美艷和嬌體）」，有權力得到這些東西。「在社會的檔案裡」的首長在罪行被揭發後，索性將追查事件真相的公安局偵察員拘捕。中央首長級人物可以隻手遮天，顛倒黑白，那麼地方幹部則在他們官轄的總編裡也儼然是土皇帝。在「調動」一文裡，牛書記利用職權強行將他的家人戚友招為縣革委招待所正式職員，「在他的帶領下，縣裡的一些副書記、常委、部長、局長紛紛粉飾自己沒有工作或農業戶口的老婆強行招工，一時形成一股老太婆招工風」。此舉不單抹掉了作為對官僚對象的下鄉知青的名額，「當老太婆太多，招工名額不夠用時，牛書記索性強令各單位接收，用所謂業務費，福利費來開支」。

以上的故事是發生在四人幫時期，但，打倒四人幫後，類似的醜聞不斷地發生。過去在四人幫手下漁肉人民的幹部，諸如上述的牛書記，一下子便成了受四人幫迫害的受害者，官員還是繼續地，人民却還是受他欺騙。在「傷痕文學」時期被譽為以厚望的老幹部也不如幻想中的完美。一些復職的老幹部一下子也獲准了特權階級的生活方式。像「悠悠草草心」裡的唐久遠，當他恢復為S市的市委書記後，領銜將他在受迫害時用以自勉的三點施政綱領拋在腦後，專心於為個人和家庭謀求更舒適的生活。當報章不斷報導中國城市住屋問題十分緊要，老百姓要一家三代全擠在丁方房子的時候，「唐書記住了一套高級房子，他的兒子還沒有對象，可又買了一個五十多平方米的單元房」。

除了這些復職幹部上任後的第一件工作，任任是為兒女去調動地，安排工作而奔忙。推動黨文編寫「將軍，不給一錢糧食」。也是直接派派於一位復職高幹，為了差自己的樓房，不惜下令挾持幼兒園，更耗用了九十七萬元外匯。這一切一切，都在一個個並非合理的理由下進行；受四人幫迫害而奔忙，吃了不少的苦，現在還不好好一點嗎？當別人提出質疑時，更不以為「追害革命老幹部」，「極左惡毒」。這些還不是化國為家，化公為私的官僚邏輯嗎？

雖然並不是每一個官僚都像黨政委、牛書記和中央首長這些十惡不赦的典型。相反，不少作者都將官僚寫成既可惡又可笑的人物。他們為兒女、職位、房子、生活享受去鑽營，討錢奉承，各盡各法的醜態令人為之絕倒。反映在「假如我是真的」一劇中，更是個個醜態的滑稽劇。但，在真實生活裡，這些滑稽劇背後將有多少悲劇呢？青年詩人顧城以豐富的想像力，將官僚與人民的矛盾加以形象化；在他的「兩個情場」一詩中，他寫道：

「在那邊，
權力要緊金幣，
在這邊，
金幣追求權力，
可是人民呢？
人民人民
知曉是它們定情的層層。」

老百姓在這場迷途中是沒有主動的角色扮演。在「悠悠草草心」裡，當老百姓議論幹部時，便會小聲地說，不論有沒有人在「監聽」，議論領導的時候都要降低聲量，這也是條件反射」。當「調動」裡的李喬林想去揭發牛書記的罪行時，他不得不更現實的考慮：「根據以往的情況，我的控告信將由中央轉給省，省轉地，地轉縣，最後還落在牛朝杰手里，那我就活不成了」。無權無勢的人民在扭去扭轉他們的命運呢？小說家祇提供了他們的三條出路。第一條出路是灰色一片，像「飛天」和「社會的檔案裡」，真理剛冒出了一點頭，便被官僚權力的壓下去。第二條路是像「調動」的李喬林，尋求的是個人的解決方法，不惜利用種種卑劣手段，祈求遠避牛書記的勢力範圍，但如果有後再再出另一條牛書記又怎辦？作者是個嘆嘆沒有回答。最後一條出路，也是最為中共官方所



孩子一服 可以可以



西民一服 政要政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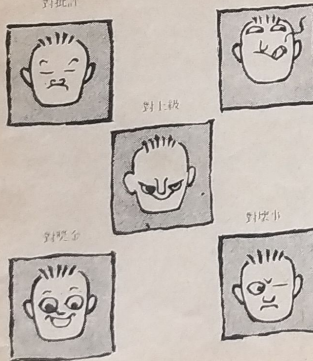
讀實的，那就是期望在官僚層內部出現一批人民的救星。就像「喬廠長上任記」的喬廠長。他排除萬難，不惜與數行軍費，而且了事的舊勢力對抗，努力將工廠的生產提上去。但，即使有喬廠長的勇氣和魄力也不易為啊！他也要花百分之五十的精力去應付扯皮，百分之十應付挨罵、挨批。對於同職或上級的制約他也為之無可奈何。「喬廠長式」的人物，在官僚特權層的汪洋大海裡是如何的渺少！

不少作家——特別是在五十年代冒出來的中年作家——都喜歡製造一個喬廠長式的人物來替故事添上一抹光明的遠景。這些將中國的前途寄望於剛正堅實的幹部身上的論點，筆者不能苟同。問題並不是在現實生活裡有沒有像喬廠長式的人物，而是他們能有多大作為？在「基礎」中的黨工團主任路永存想了很久的問題——為什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揮不出来，為什麼號稱黨家作主的工人當工廠不關心——終於找到了答案：「樹木長不出在基礎上面！」，路永存也祇能把他個人的熱誠和勇氣，鼓舞起工人積極地修快機器。至於其他車間主任的敷衍塞責，廠黨領導的漫不關心，路永存和工人們也祇能是一籌莫展。

最近，中共的輿論機器越來越厲地批判「在社會的檔案裡」和「飛天」這兩個電影劇本。雖未定為「毒草」但此批評為「嚴重錯誤的錯誤」。極壞的政治影響」。罪名之一就是醜化幹部，貶低幹部的一小塊而沒有看到光明的大部份。但，問題同樣是：重要的並不是有沒有軍部首長，辦政委這樣個個的人物（不過，中共不是曾經揭發幹部利用職權，強姦和誘姦了百多名一心想招工回城的下鄉女青年嗎？）。而是目前中國的幹部制度裡有沒有可行的方法去制裁和撤換失職腐化的中央和地方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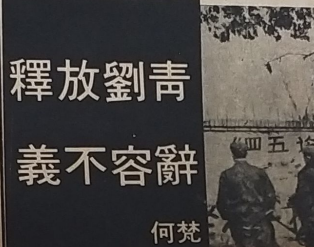
雖然中共最近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其中特別提出了幹部不准搞特權，要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也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處理有關事宜，但這種從上而下的清洗能否有效實在令人懷疑。「政治生活若干準則」裡所說的老話歸老話，也不過是些老話歸老話。各級領導幹部應聽取所在單位的黨員和群眾意見，重視群眾來信，以群眾意見作為獎懲依據了。但最後權力還是在領導幹部手中，在任何幹部上，基本上仍是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人民是被排斥在決策權之外。

所以，祇要中央和地方的幹部仍是脫離人民群眾的監督，祇要列寧從巴黎公社的經驗所得到任免官吏的原則——國家官員由人民選出和有權隨時撤換，薪金不得超過技術人員的水平等——仍不能實現，一切舊社會裡貪官污吏的舊把戲便又復活起來。況且對於工人國家的官僚而言，權力保存對他們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他們不是資本家，沒有私人資本。那麼，全能力量的來源是從人民手中剝奪來的權力。那麼，如果沒有從下而上的監督，又怎麼期望官僚層內可以自我改良呢？現實的例子告訴我們，當人民群眾起來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時候，中共便使用各種方法壓制下去。鄧小平那一頭還向外國記者聲稱大寫字報是憲法上規定的權利，這一頭却在憲法上取消「四大」。所以像喬廠長式的人物，在中國現存的制度下是沒有出路的。



北京民辦刊物「四五論壇」的召集人劉青自從去年十一月一日被北京公安局扣留後，延至今年八月四日才有消息證實他已被判處三年勞動改造。罪名有三項：(一)他去年一月在天安門廣場參加農民的遊行示威；那次遊行是由傅月華所組織的，傅月華去年底已被判刑二年。(二)他參加偽造魏京生案卷的筆錄。魏京生是北京民辦刊物「探索」的創辦人之一，去年十月十六日被判以十五年監禁，罪名是向外國人提供「軍事情報」，和違反了憲法中規定的條文「公民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三)在將近一年間，竊取和偽造偽造證明書。

劉青被檢的直接原因是由於魏京生被判刑後，「四五論壇」將審判過程（上午部份）和魏京生的自辯詞紀錄下來，印成小冊子在十一月十一日在西單「民主牆」前傳售。當時有數百名市民排隊搶購，但隨即遭到工人黨團人員干涉，當場拘捕了搶購者及在場群眾六人，其中包括「今天」雜誌的編輯龐春清、「中國人權同盟」的成員焦洪明（譯音）等共五人前往個人。



何梵

劉青的被捕和現今的犯罪，可以說是在看到口口實實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中共，是如何任意踐踏自己訂的法律。劉青被捕後，他的弟弟即到公安當局詢問，所得的答覆是「行政拘留」。根據一九五七年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行政管理條例」中第三條所規定，行政拘留是半日以上，十日以下而最高不得超過十五日。而在五個人大通過的國家逮捕拘留條例第八條也明確規定「公安機關拘留的人犯需要逮捕的應在拘留後的三天之內，把拘留的人犯需要逮捕的材料通知本級人民檢察院，在特殊情況下，拘留時間可以延長四日」。但劉青在沒有任何罪名而僅僅為行政拘留的口實下被捕已超過超過十五天。直至最近才被刑判定罪。

劉青的三項「罪名」實在不值一駁，罪名之竟然能夠成立，祇顯示出中共官僚專橫和目無法紀。魏京生的審訊是「公開審判」。但，不單出席旁聽者是由有關單位組織，外國記者不得其門而入，而且中共章章登載的也是法庭的判決詞和引述魏京生的片言隻語。既然中共之名為公開審判，那麼人民是有權知道整個審判的過程。出售法庭審訊紀錄這一行動便是完全合情、合理和合法了。

劉青參加農民遊行也完全是中共憲法所允許的。進行「集會、結社等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讓農民為了反壓迫、反抗而到北京上訪，組織遊行來爭取自身的權益，作為中國人的一份子，難道不可以參與支持，行使應有的公民權利嗎？

至於第三項罪名，更令人覺得加罪之罪，何患無

。在中國，由於廠房各級領導的層層卡壓，早已嚴重傷了工人羣衆的生產積極性。拿工資開大天，告假等現象十分普遍。即使劉青真的偷竊和偽造病假證明書，他告假的動機和效果是什麼？參與農民遊行示威？組織和出版「四五論壇」？一直強調「社會效果」的中共，為什麼不去調查研究一下。況且劉青所偽造的也是病假證明書，這不是盜竊國家財產，那些浪費公費、假公濟私的幹部，不大了也是徹頭徹尾或者黨內紀律違犯了。兩者所造成的「社會效果」孰輕孰重，一目了然。

況且，我們有理由懷疑第三項罪名的真確性。在魏京生案和傅月華案裏面，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共的起訴人和中共所控制的報紙，都企圖將這些民主運動份子描繪成反黨反國的份子：魏京生是一名「裏通外國」，接受外國人款項的份子，而傅月華則是一個小流氓。

所以，根據這三項罪名而將劉青判罪是不合理的。他只行使使中共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恰恰相反

北京公安局才是踐踏公民權利，違反法定的十五日行政拘留限期。假若五個人大通過的「刑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國家不保障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對負責任人員予以刑事處分」，那麼，北京公安局又應作何處理？

明顯地，劉青等的判刑，是緊接着魏京生、傅月華的判刑。劉青被捕後，他的弟弟即到公安當局詢問，所得的答覆是「行政拘留」。根據一九五七年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行政管理條例」中第三條所規定，行政拘留是半日以上，十日以下而最高不得超過十五日。而在五個人大通過的國家逮捕拘留條例第八條也明確規定「公安機關拘留的人犯需要逮捕的應在拘留後的三天之內，把拘留的人犯需要逮捕的材料通知本級人民檢察院，在特殊情況下，拘留時間可以延長四日」。但劉青在沒有任何罪名而僅僅為行政拘留的口實下被捕已超過超過十五天。直至最近才被刑判定罪。

中共判劉青的罪，是因他反對中共官僚的統治和他對爭取民主的獻身精神。兩在他被捕之前，在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時，劉青說：

「民主的到來是要犧牲的——不僅要流血，甚至還要犧牲性命。覺醒的人民是敢於站起來的。我們已經認識到，問題不僅在於更換幾個領導人。問題不會因為華國鋒之代替毛澤東、鄧小平之代替周恩來就解決。更加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有缺陷和因此，要改善中國的落後，要改變人民的政治權利和法制的完善，我們必須根本地改變這個體制。這不會在一個早上或一個晚上就能達到，必須先改變人民的思想觀念。我們要解放人民的思想。」

這些思想觀點並非中共的官員們所能容忍的。他們企圖透過囚禁來壓制它們。

劉青是無辜的，我們要求他的立即釋放；而這也是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正義和爭取的。

(錄自「四五論壇」七九年十二月九日第十五期) 青石

劉青簡介
劉青又名劉建偉，現年卅歲。後為英國駐華大使館官員。四八年因患傷寒病逝世。母親隨其父受僱於美國駐華大使館。前(解一筆者)致後參加工作任衛生材料廠，前二年退休。
劉青六五年前在北京讀書，六五年押解到山西曲沃，七年被遣返為工農兵學員，就讀於南京工學院。七七年畢業後分配在漢中三機部豐業機械廠

工作，因病(腎炎)到北京就醫(領導批准)。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帶病積極參加創刊民刊「四五論壇」並寫了幾篇在羣衆中享有好評的文章。並將自己的住所作為「四五論壇」接待來信來訪的地方。熱情接待了各界來訪者。為民主革命和「四五論壇」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七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因醫警拘捕在民主牆前發售及購買魏京生一案審判過程的羣衆，劉青前往市公安局詢問拘捕的原因，並申明此小冊子是組織印刷發售的。
於當日晚時被市公安局在信訪處扣留。後經家屬詢問，說是行政拘留，至今未見釋放。

為什麼要有一個

在上期「戰訊，新思潮」月刊上，刊登了一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常委會」的聲明；該文分析了香港政府最近推出的「地方行政模式條約書」的背景和統治者的動機，指出該條約書的主張實際是不民主的。所以，該聲明主張說：

「香港政府的政策應該由香港市民決定，人民無權的狀況必須結束。所以，應該召開一個「普選全權的香港市民代表大會」，以代替目前的殖民地獨裁統治，讓這個大會訂一切社會政策。」

為什麼要提出這個主張呢？香港市民代表大會會有那些功用，以改善香港市民值得為召開這個人民代表大會而奮鬥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目前的香港政府之本質，看看它實際上是否可以代表佔香港人口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以及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政府的最高級行政官是由英國直接委派的港督。其它司級公務員，由港督委任。港督祇向英國政府的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負責；而受他委任的公務員自然得向他負責了。

這樣的一個權力架構，顯不出香港政府的殖民地統治性質。它第一是不民主的，第二是從屬於宗主國的，第三它必然要維護宗主國的利益。

英國的統治階級對香港的統治中搜括到巨大的利益。就以香港每年財政盈餘所積累下來的儲備金為例。雖然歷年來不少人士提出將那筆為數巨大的金錢（現在估計超過七十億元）從英國銀行調回用作公共社會福利。但香港政府始終不肯這樣做，原因這筆款項是英國財政支柱的一個部份。結果是香港人民的金錢成了英國經濟危機的犧牲品。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財政司夏理基在立法局表示，本港之廿八億元儲備金，已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至年底的八個月內，由於倫敦證券市場的疲弱，估計已降至約二十億元。

另一方面，香港還替英國養活一批職業軍人，每年為此花去八、五億元。

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向中國進行經濟剝削和掠奪的橋頭堡。當時在華的幾間英國大財團，解放後轉移到香港作為活動中心，例如以金融投資為主的海匯豐銀行集團；以商業活動為主有怡和集團。這兩大資本財團在今天不單仍是香港的首要大財團之一部份，對香港的經濟活動起着重要的影響力；它們還實際上影響了香港政府的政策。（例如：怡和「配合」着香港政府發展港門的政策，大幅購入該區土地，結果是財源廣進。）

在香港有股票上市的十間盈利最多公司之中，其中八間是英資的，第九間（恒生銀行）的多數股權亦

「港九人民代表大會」？



在美資匯豐集團手中。

為了這種經濟利益，大財團的殖民地主義者控制着香港政治制度裏面的兩個最重要的機構——行政局和立法局。

除了有必須支持港督政策的官守議員外，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都完全由港督任命。由於英殖民地主義者的共同利益，港督自必委任那些大財團的代表為議員，例如：立法局議員紐璧堅為怡和公司、電車公司和天星小輪公司的董事；新德魯為煤氣公司董事；拿波德則同時為電話公司、天星小輪和香港電燈公司的董事。

在立法局內，還有一些軍人議員。但他們亦大部份是大財團（其中主要是公共事業）的董事。例如：立法局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胡悅強，便是時電話、港燈和天星小輪的董事。而胡百全則是中巴和九巴的董事。

這樣子組成的立法局，選擇每一次公共事業申請加價，都集中在立法局內討論。這就使大財團可以輕易地控制立法局對公共事業的加價。

最近幾年來香港政府受人詬病的一項政策便是高地價政策。在這項政策下，由於政府有意減少批出官地拍賣，致使建築用地供不應求，於是地價高漲；再經過大、中、小財團的投機炒賣，樓價樓租更急劇上升。受這項政策所苦的自然是中、下階層的勞動人民。可是，儘管社會上非議之聲很多很大，香港政府和立法局都不聞不問，原因是什麼呢？

很簡單，大財團從這項政策下得到巨大的好處。以高價拍賣的土地，只有資本雄厚的財團才可以交付得起，結果是大財團日產數千有租利可圖的地產得地。例如，置地公司於一九七〇年以二、五八億元投標，分期免息付地價給香港政府的方法，連同建築費，實質上只付出一、四億元左右的投資，較地價低出一億多元，以後七年的地價分期便可用租項抵付。實是極之化算的一項投資。

所以，香港政府給大財團種種方便，卻給苦大衆不夠的照顧。數十萬的家庭要等候六、七年才得一間公共房屋。一九七二年港督提出的十年建屋計劃，顯然不會在今後兩年內實現；至於仍然住在貧民窟的徙置區內的五十萬人，八年內難到政府有十多人得到改善。同樣地，五十萬的老年人中，祇有極萬的產業工人；而且，香港的政治制度與勞動人民的多少部份得到社會福利的照顧。但政府的官僚還是關係最密切。倘若他們積極起來爭取要有一個「人民代表大會」，迫使統治者接受這個要求，那時工人和家、大財團和殖民地主義者的利益服務的政府；正是其他勞動階層祇可以利用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房屋由於這個原因，它是不民主的——既不維護勞動大眾、教育、交通等等。

的利益，阻止大財團的瘋狂剝削，又不讓人民去選舉它。

資本家和大財主祇是一小撮人，倘若一個政府事事以這些人的利益為依歸，就不能解決大多數人的共同問題。公共房屋不夠、公共交通設施不夠、十一年而非九年的免費教育、更多的醫院病床、更低廉的高等和專業教育、公務員和教師的更合理薪級和升職制度等等。

可是，要一個政府去解決社會上大多數人面對的切身問題，就得有一個向市民負責的政府；它不單要反映民意，還要由真正受人民支持的代表組成，才能推使它實行各種措施解決社會上各行各業各階層市民的問題。

香港市民代表大會倘若召開正是可以起着代表全港市民的作用。它的成員由市民民主地直接選出。凡與各行各業人民有關利益、社會政策、福利、房屋、教育、交通等等問題，都可以通過由市民選出來、向市民負責的政府去解決。

香港政府最近幾年來做了不少工作，表明它是一個接納民意的政府。它進行了各種實驗和模式，由六七年暴動後開始的民政署，到市政局獨立，到鄉議會改革，到增加立法局席位等等。但所有這些實驗和模式都沒有使香港有一個更民主、更滿足勞動人民生活要求的政府和制度。目前提出來的「地方行政模式」，也不能做到這一點。香港市民並不能靠這種改良就可以使政府在維護市民大眾的利益方面目根本的改變。

從香港政府最喜歡聽話的諮詢委員會看，全港二百多個這類委員會中，沒有一個有代表勞動大眾的人士在內。委員會的成員若非政府政策的應聲蟲，便會很快被排擠掉。而最高級的諮詢委員會的行政局中，九名非中區地王，但從簽約時起至一九七二年大廈建成入伙，用分期免息付地價給香港政府的方法，連同建築費，實質上只付出一、四億元左右的投資，較地價低出一億多元，以後七年的地價分期便可用租項抵付。實是極之化算的一項投資。

比較起香港政府提出的「地方行政模式」，人民代表大會才是具有真正民主內容的權力架構，可以讓市民使政府向市民的大多數的利益負責。

工人階級的情況恰好相反，他們是最需要和最有能力爭取一個民主政制的社會力量。因為勞動者擁有寬敞的徙置區內的五十萬人，八年內難到政府有十多人得到改善。同樣地，五十萬的老年人中，祇有極萬的產業工人；而且，香港的政治制度與勞動人民的多少部份得到社會福利的照顧。但政府的官僚還是關係最密切。倘若他們積極起來爭取要有一個「人民代表大會」，迫使統治者接受這個要求，那時工人和家、大財團和殖民地主義者的利益服務的政府；正是其他勞動階層祇可以利用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房屋由於這個原因，它是不民主的——既不維護勞動大眾、教育、交通等等。

定閱「戰訊·新思潮」全年二十元

你一定已發覺很難在報攤上找到「戰訊·新思潮」。原因很簡單，這個社會是以金錢掛帥的，我們的刊物銷量有限，利潤不高，很多報販不是拒絕寄賣，就是將它放在不显眼之處。

保證你每期可以看到「戰訊·新思潮」而又省力的辦法，就是立即訂閱。

填妥下列表格寄回紅磡庇利街九號八樓：

姓名：
地址：

參加我們的行列！

你是否不甘於做一個沒有思想、苦悶而失落的青年人？你是否常常考慮到自己可有什麼社會責任？你是否更時刻苦思着人類社會的出路？

本刊正是為了解答這一系列的大問題而產生的。它站在青年人一邊，做一個積極的社會改革者。它努力尋求一條思想出路，從而掌握這個社會的規律性，並在此一規律性中確定自己的位置。

親愛的讀者們，假使你成為我們的通訊員，你就可以與我們並肩前進、共同合作。

作為一個通訊員，你可以：

(+)投稿：不論你是否具有寫作經驗，我們都鼓勵你多點寫作。

(+)參加本刊所主辦的活動：我們會就思想、人生觀等等問題主辦座談會或演講會。

姓名 _____ 性別 _____
年齡 _____ 學歷 _____
學校/職業 _____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柬埔寨難民營訪問報告

〔編者按：米爾·奧斯邦是聯合國駐柬埔寨難民地營的一位顧問。在今年三、四月間，他在泰國向柬埔寨難民進行了一系列訪問，本文是有關這些訪問得到的資料，原載遠東經濟評論六月六日。〕

對柬埔寨國內繼續存在重大困難——尤其是分發糧食的困難——的關心，已導致不同類型的評論家爭論說，這是停止把柬埔寨的麻煩歸咎於已被推翻的波爾特政權的時候，而要把批評指向現時控制這個國家的時候。

那些支持東協五國繼續在外交上承認民主柬埔寨的代表立場的人，從十分不同的角度堅持，這項政策毫不代表贊同波爾特和他的同伙，而是一種表示不贊同越南人侵入柬埔寨的行動的方法。

這兩種對柬埔寨危機的處理態度，以其不同的方式，趨向於減低波爾特及其同伙統治柬埔寨的頭項的重要性。當只有中國政府是預備全心全意支持赤柬的時候，波爾特政權對柬埔寨的統治的必要性和意義是有可能被忘記或誤解的。

在一個對抗著一個又一個重大的危機的世界裡，是容易忘記波爾特政權被逐出金邊僅有十六個月。除了遺忘外，在國際上差不多是完全不知道或淡視，僅是在一九七九年中，在柬埔寨戰鬥的越南人終於成功地對這個國家的大部份低地地區加以廣泛控制。簡短地說，赤柬政權是一件在最近才過去的東西，以為在曾經在它的統治下受過苦的人的心目中，其統治的影響已消失了，是過為太早。

沒有任何一處地方比在泰國的難民營更清楚地顯示這一點。在那裡，顯著地除了那些仍然是赤柬的追隨者外，波爾特政權的頭項對難民的態度有最深刻的影響。

入侵之後的時期裡的混亂和破壞，已導致他們差不多全部決意尋求在第三個國家定居。至於那些在社會經濟天秤的另一端，赤柬統治的時期沒有帶來永久性放逐的願望，而是只要沒有和平和穩定的保證，就普遍地不願意返回柬埔寨。

形成所有這些態度，主要是有關一九七五年四月赤柬贏得他們的勝利後發生的事情的動盪記憶。這些記憶的基本內容是比波爾特頭項的巨大的人類（包括生命）代價。

缺乏一項在柬埔寨內外的龐大訪問計劃，看來是永遠不可能真正滿意地估計在一九七五年四月至一九七九年中對越南人的重大抵抗結束時，有多少人由於被處死或由於飢荒和病菌而死亡。

一項在泰國的難民營進行的、試圖調查一百名難民的家庭成員損失的深入訪問的結果，肯定不能用來作為整個柬埔寨人口的死亡的準確估計的基礎。可是，基於抽取的訪問對象的性質，湧現出來的圖畫是又一個理由支持波爾特及其同伙當權時發生大規模的人命損失的結論。

這調查中，難民樣本的收集是相當細心地進行的，他們合理地廣泛反映了一九七五年前在柬埔寨的各職業和地區。因此，在樣本中，有五十九人曾作過農民和漁民，或是低層的城市工人（四十二個農民和



漁民，十七個低層城市工人）。樣本包括來自金邊及以外十四個省份和兩個在柬埔寨以外地區的人。組成樣本的難民來自八個不同的難民營。

在樣本中，不下於四十人曾因處死刑而失去親密的（核心）家庭成員，總數達八十八人。有驚人重要性的的是，在有近親被處死的四十人裡，有廿七名是來自農民一漁民和低層城市工人組的。這樣本的證據當然實在地反駁在過去曾聽到的論點，這些論點暗示在波爾特下發生的任何處死，只是過去上層份子或官員。

在樣本中有較少數目的人報告在有他們近親以外的親屬因處死刑而身亡。有卅三人紀錄這種死亡，失去親屬的略低於一半是來自農民一漁民、低層城市工

當他遇到任何困難時，最多也祇有自己的家人會支持自己。但是諾瑪蕾却要我們明白：自己的工友也進而更加是一個可以依靠信任的力量。工人的眼界不應祇是局限於個人和家庭的小圈子裡，而應該擴展到獲得從整個工人階級的角度來看問題，要從工人階級的事業中找尋自己的位置。

諾瑪蕾還要我們了解到工會的歷史意義。她在出獄後對她的子女解釋她為什麼要參加工會時這樣說：那不僅是為了我們這一輩的人著想，而且更是為了你們這一代人的理想。我們現在進行鬥爭，是希望當你們下一代進入工廠工作時，能夠獲得較好的待遇和生活。

諾瑪蕾透過這些說話，點出了工會的價值。工會運動，祇當它不僅能造福目前的工人，它還能為工人的一代，以致以後世代帶來較富裕文明的生活，才真正具有不朽的意義。

我們有些父母也很希望他們的女子不必重演他們的黑暗生活，但他們用的却是逃避的方法，而非積極的鬥爭道路。他們索性叫孩子們不要做工人。「努力鬥爭的道路。他們索性不出頭，不如當白領罷！」然而諾瑪蕾却採取迥然不同的做法。現狀不能滿意嗎？就去改變它！

具有這種樂觀、進取、獨立而又自覺的氣質的諾瑪蕾，為我們香港工人帶來了清新的形象。她使人感到，做工人要忍受那麼多不公，往往由於自己悟到，做工人要忍受那麼多不公，往往由於自己悟到，不深，視野狹窄。祇要人們肯積極地尋找出路，那麼他們遲早會獲得成功的。

何虹譯

人組的。因為當難民們討論到他們較遠的親屬時，對準確的數字有較大的不肯定程度，提供一個遠超別死亡的最後總數是不可能的。明顯的是，被處死的較遠親屬的數目超過二百。

由於飢荒和病菌而死亡是低於可能有的估計，只有樣本的二十個成員報告他們有密切的家庭成員在波爾特時期因飢荒和病菌而死亡，這總計有四人。在討論及難民樣本中，再次不僅是上層階級方面的痛苦，報告他們有家庭成員因飢荒和病菌而死亡的其中十四名難民是來自農民一漁民、低層城市工人組的。

還有一項統計資料值得指出。在訪問過的一百名難民中，不下被四十二名報告看見死刑的進行。這數字是特別重要，因為得出一個有趣的資料是：在波爾特下發生的早期，處決大都是在使人口大衆看不到的情況下進行的。例如，很多難民報告說曾看到被處死的人的屍體，但不曾看見死刑的進行。

可是，有一個強烈的印象是，隨著波爾特政權面對的困難，由於內部政策的對抗和與越南衝突的增長而增長，關於被處死刑的注意消失了。與被受害者帶走的程序相反，農民合作社的人民被集合起來目擊處決者被處死。

對於理解波爾特政權的暴政，統計數字在今天的。但同樣重要的是，在那時期生活過的人在今天持有的主要印象。這些印象對結構的事實和數字添加上人類的尺度。

難民一再地談到在波爾特之下生活的恐怖。生活是「壞得不可形容」。有一位因死刑而失去了姊妹和兄弟的人的講法是：波爾特的那頭是「他們時常面對死亡」的時候。對於另一位有父母在波爾特時

期被處死的求母美

人，提供這証言的另一個令人心寒的一面。這個人毫不畏懼地告訴訪問者，那被處決「只殺死那些「破壞規則」的人、八個懶惰的人」和「資本家們」。有一位前赤柬士兵完全沒有表情地談到這個人如何把三位「新人」推進監獄殺死他們，和把另外約十二個人投進一口井裡，然後堆上泥土，使他們窒息而死。

不認識到繼續承認波爾特是沾污了在柬埔寨內外的柬埔寨人的感受，表示人們對赤柬統治的頭項正是如何恐怖這方面仍然認識太少。對於那些年頭的記憶和對赤柬統治的惡感造成的力量不能高估。波爾特仍然有影響力，但不再是作為一個在未來會起作用的神體領袖，而是作為為數大數柬埔寨人再不願意重現的過去的一個象徵。

終於尋找到自己的使命的諾瑪蕾，怎能不滿意地笑了呢？

可惜導演在表現工人生活的刻苦方面下不夠功夫，使觀眾對於紡織工人何以要組織工會以求改善生活欠缺令人信服的交代。究竟工人的待遇到何種程度？他們的困苦是怎樣的？工人所感到的不公平等表現在什麼地方？導演都著墨不多。即或偶爾涉及，也顯得非常空洞，欠缺感染力。例如多次描寫工友間討論內閣問題、羅賓向工友宣傳工會的重要性那次漫談、等等幾場戲，都缺乏對工人的被壓迫境況的具體說明。這大概是導演對於工人階級的處境沒有仔細觀察過而做成的弱點。

導演花很多屏陣展示諾瑪蕾的一步步的自覺的轉變。不過，他卻沒有處理諾瑪蕾一樣去處理她的工友，不能做到反映出組織的工友也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認識，最終達至認同工會的整個階段。當初工友大多遠離工會、遠離羅賓和諾瑪蕾，但後來諾瑪蕾與廠方衝突，工友們却以同情羅賓來支持她，並由此而引起了工人組織工會的熱潮。但是，工友是怎樣冷淡地認同工會的，導演卻沒有策略分明的交代，致使那一場戲，說諾瑪蕾站在樹上高舉「工會」的牌子時，工人紛紛停工支持，僅有一種煽情作用，而沒有深入的剖析。我不很相信，諾瑪蕾這個舉動真會引起那樣的反響，尤其是導演很少談及諾瑪蕾在工友間進行工會活動的全部過程。

不過，這會獨損這齣戲的主題的健康性。即此便仍有它的價值。

【續10頁「諾瑪蕾」】

諾瑪蕾婚後，越來越同丈夫發生衝突。丈夫要求她放棄工會工作，返回廚房當其「黃面婆」，像千千萬萬的妻子一樣料理家務、照顧孩子、慰籍丈夫。但是諾瑪蕾拒絕這樣做。她把工人階級的事業置於個人主義之上，她寧願把工餘時間的每一分鐘貢獻給有關工會的工作，而不願把自己淹沒在毫無價值的「黃面婆」的崗位上。她的堅強態度並沒有說服到她的丈夫，但至少使他明白到諾瑪蕾是一個獨立的人，不是他的附屬物，而是有她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事業。而這種自覺的獨立人格，不管他自己是否同意，乃是她必須要尊重的。

諾瑪蕾終於越過了阻力。工廠大部份工人終於參加了工會。但她的成功得來不易。她是經過了長期的奮鬥，以無比的忘我精神和犧牲勇氣，向工人指引出前進的道路，使他們明白到自己的痛苦生活不是被命定的，讓他們了解到自己的潛在力量有多大。正是諾瑪蕾那種不計較個人得失，以工人兄弟姊妹的共同事業為己任的意志，才能感染到她周圍的工友，使工友們能在諾瑪蕾被警方打擊時挺身而後保衛她、舉行支持她的同情罷工。

「諾瑪蕾」拍得不完全好，但那個女工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敬愛的，因為她向我們傳達了一些很少人知道的信息。她叫人知道，工人兄弟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是他們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工友間的團結互助，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平常時候，當工人沒有組織時，任何一個工人都不過是孤零零的一個個體，

「諾瑪蕾」

一個紡織女工的故事



人忘記的。以「阿輝」式的人物的電視片集，或者是武俠片、或者是偵探懸疑愛情悲喜劇……但可有什麼電影是以工人生活為題材的呢？

就算真地有那一類電影，結果也是夠使人洩氣的。它們大多是匆匆上畫，匆匆落畫。來去之間不會有什麼宣傳、不會有人捧場。正如工人在社會最低層裡是那樣沉默無言，以工人為題材的電影也被人擱在一旁。

「諾瑪蕾」這齣戲也沒有例外。但它所反映的問題，它所刻劃的社會眾生相，它安向觀眾傳達的那種信息，却不會、也不會過去。

諾瑪蕾是美國南方小鎮的紡織廠的一個女工，一個小人物電影就是以這樣一個平凡女性為中心，描寫她如何從一個混混沌沌的女工，在一個來自紐約的工會組織者羅賓的幫助下，逐漸轉變成一個有明確的人生目標、自覺地投身到工人階級的工會運動中去的人員。影片以她的轉變為經，她如何犧牲自己而導致廠內工人跟隨她參加工會為緯，交織成這個故事。幕終前諾瑪蕾在陽光底下滿意地笑了，為了工會的最終勝利。

馬田·烈特執導的「諾瑪蕾」，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的製作反映了美國社會近年來的雖然緩慢，但異常沉重有力的轉變；美國工人開始抬頭，工會運動比較蓬勃。自從七三至七四年的經濟衰退後，美國工業生產一直都沒有好日子。最近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資本家的利潤下降，却把危機轉嫁給工人化的跡象。資本家的利潤下降，却把危機轉嫁給工人化的跡象。資本家的利潤下降，却把危機轉嫁給工人化的跡象。讓工人吃過了失業、待遇菲薄、通貨膨脹之苦。政府也來幫資本家一手，大量削減社會福利。工人為了保障他們的權利而被迫進行鬥爭。工會就成了他們與資本家和政府抗衡的主要工具，因而工會運動趨於上層。這個社會性的變化不能不反映到傳播媒介，特別是電影裡。

影片所塑造的諾瑪蕾這個人物是頗成功的。要知道，影片所要刻劃的角色，不是一個已經定型的人物，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形象。導演所要做到的，就是把在開場時那悶悶的、隨波逐流的諾瑪蕾，和閉幕前那得意地笑了的諾瑪蕾之間架起一條橋樑，使前一個諾瑪蕾可以成功地轉變為後一個諾瑪蕾，使觀眾能夠清楚地看出後一個諾瑪蕾是在怎樣的情形下產生的；她

讓，首先是工廠生活的無比痛苦。為了做這不堪的工，工人便像牛馬一樣的奔勞。影片開場未幾，便接上了諾瑪蕾在廠房忙碌工作的情景。這場戲是一個伏筆。諾瑪蕾不斷轉折於四周的機器之間，仍似成了滅器的奴隸，為了餵養那急速轉動的機械而來往奔走。暗淡的燈光底下，整座廠房完全為恆久的震耳欲聾的機器聲所掩沒。緊接著諾瑪蕾在休息午膳時猛於發覺與她一同工作的媽媽失去了聽覺。她駭然了，立即強拉著茫然不知所措的母親去找鞋廠醫生。但後來的却只是冷嘲：「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你可以叫你媽媽找過別的工作呀！」諾瑪蕾氣得大叫：「但這是這個小鎮唯一可以找到的工作呀！」「來！媽媽！他們是不管你的死活的！」

造成諾瑪蕾的轉變，當然還有許多因素。但工廠老板的壓迫、剝削、工人生活毫無保障、怨憤狀態，却是一個先決條件。導演在這方面刻劃得不够深入，但他多少讓我們看見了一個工人的命運。諾瑪蕾的心不親善了，她父親不堪勞碌而死了，她自己因為好打不親善了，被資方用詭計來離間她與工友之間的關係，使工友誤認她做了資方間諜而被工友憎惡。還有那個抱怨資方不讓工人看到街裏對封鎖門的工人，指出資方剝削工人的羅賓，以及老板不惜一切阻撓工會在廠內立足，等等。老板之所以能夠如此專橫，都是由於工人一無所有。除了替老板做工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所以當羅賓在工廠訪問一個工人時，他問：「你喜歡你的工作嗎？」那個工人望望老板、又望望羅賓，大聲說：「我喜歡的就是保留這份工！」

面對如此惡劣的環境，工人該怎樣做呢？後來成為諾瑪蕾的丈夫的那個男工說：「去飲酒來忘記不滿。」

但是諾瑪蕾的答案却與他不同。從一開始，諾瑪蕾的剛直、衝突的性格已經使她比較積極、進取。特別壓迫，她慣於用反抗精神來克服壓迫。好打不平的個性使她被資方列入黑人物，稱為「多咀婆」(BIG MOUTH)。

個人的積極進取的精神是不可少的。但必須要找個別的條件來配合方才有用。個人無論怎樣英勇，如到別的條件來配合方才有用。個人無論怎樣英勇，如到別的條件來配合方才有用。個人無論怎樣英勇，如到別的條件來配合方才有用。

影片安排了羅賓成為諾瑪蕾的啟蒙老師。羅賓某次發表了一項演說，這對於諾瑪蕾是一次極大的啟發。羅賓說：工會就是一個整體，一個由許多工人組成

要求，別人就不會聽不到了。

羅賓的演說打動了諾瑪蕾，為她開啓了未曾前見的廣寬天地。她終於明白到，與資本家周旋，單靠個人力量是不行的。集體的問題只能集體地解決。羅賓與廠老板的這一場較進一步加深她對工會的信心。羅賓與廠老板的這一場較進一步加深她對工會的信心。羅賓與廠老板的這一場較進一步加深她對工會的信心。羅賓與廠老板的這一場較進一步加深她對工會的信心。

諾瑪蕾終於找到了同資方周旋的力量：自己的工友組織起工會。

諾瑪蕾參加工會固然並非易事——她自己經過了遲疑、思考、經過了與自己的保守的一面鬥爭才踏足工會。但是諾瑪蕾說服她廠內的工友也參加工會，却是困難多一百倍。做工會會員像是跟錢打仗一樣。羅賓發覺了，把組織工會的棒子交給了她。她也必回頭來把棒子交給別人，把周圍工友一一吸收到工會裡。

導演把這個故事的主人翁安排為女性，大概是有特別用意的。他明顯地想藉此而為影片製造更多的高潮，使人物之間的衝突更為曲折。作為一個女性，諾瑪蕾比一個男性工會組織者所不會碰到的障礙。一個男工不會由於特別「風流」而被視為不道德，人們也不會根據那個來攻擊他。但是曾經被視為「水性楊花」的「弱點」，大肆地說謊，務求阻止工人受諾瑪蕾的影響。資本家總是害怕工人組織工會（他們對工人的超級剝削，由於工人的散漫無組織才獲得保證），他們就越是瘋狂打擊諾瑪蕾，而且利用社會對女性的普遍歧視而力圖孤立她、監視她、威脅或威脅工人性的她，等等。這種大扣帽子的做派勾當竟敢導致工會的，上層官僚份子害怕起來，要追諾瑪蕾退出工會。羅賓據理力爭，說資方對諾瑪蕾的指責純是謊言（他們說諾瑪蕾色誘工人參加工會）；但是那兩個西裝革職的工會高級職員說：「不管這真是假，她是有不好的聲譽，羅賓氣得把他們趕出門外，確是快夫人心。」

但還有更大的障礙——一個女性才會碰到的障礙。但還有更大的障礙——一個女性才會碰到的障礙。但還有更大的障礙——一個女性才會碰到的障礙。

「紀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義五十周年」

女工並不渺小

蘇堤子



此書於一九七八年四月由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全書剛好一百頁，分兩個部份，前半部（六篇文章）是由向警予的友人執筆的紀念文章，我們可以從這裡認識向氏生平事跡。後半部（十八篇文章）是她的遺著選編。這後半部較重要，它使我們對這位烈士的政治見解有鮮明的印象。而她也在此表現出共產主義者應有的高尚人格。然而全書的中心點却不在前二者，向氏是一位婦女解放運動先驅，她從不動搖地肯定勞動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及其革命的動力，並終其一生以解放中國婦女為主要任務。她在文章中不時喚醒婦女，呼呀她們團結起來爭取本來就屬於她們的東西。這是促使筆者介紹此書給讀者的主要原因。

其時代及其生平

向氏在一八九五年七月十六日生於湖南，那時正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洋務運動徹底失敗的一年。當她十六歲時（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雖然獲得勝利，推翻了腐朽的滿清政權，但國家政權旋即落在軍閥手裡，而這班軍閥政客的後台就是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它們才是真正掌握中國的統治者（上一期刊物中有一篇書介的文章——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對中國此種時期的局勢有極精確而深刻的分析，值得讀者參考）。中國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受到列強的壓迫。在此情況下，中國人民強烈要求推翻帝國主義的控制，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然而，這班民族革命的領袖們；中國的軍閥領袖們不僅不能領導它，反而由於甘願受英、美、日等國統治者的收買而充當其代理人反擊。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却軟弱無力，不能堅決地與軍閥政府作鬥爭。民族解放任務，遂沉重地落在工人、農民身上。構成了真正革命的半數的婦女，特別是女工，也就天然地分担了這個歷史任務。

向警予接受這個挑戰，她當時寫道：「一方面爭自由，擴大民衆組織的戰鬥力，尤其應當解着工人階級完成其大規模的組織之戰鬥力——因為他是真正的革命勢力——以打倒賣國的軍閥政府而建設人民政府。……」

第一次大戰後由帝國主義列強以虛偽的和平口號召喚的凡爾賽和會中，承認日本向中國提出並強迫中國接納那足以亡國的廿一條款。當時，向氏在湖南辦小學，聞得消息，憤怒不已，立即帶領學生到街上遊行抗議及演說，以支持全國保國運動。此時，向氏更加認識中國所處的境地，國內愚昧的人民被軍閥及帝國主義者壓迫至頭也抬不起來，她為了達到解放國民的願望，不斷尋求真理。一九一八年，她加入新民學會，初次接觸共產主義思想，從此，她便循此路摸索。

一九一九年，法國在中國招收越洋勞工，向氏藉此機會便發起湖南婦女界勞動工儉學運動，号召婦女參加此一赴法學習的機會。她在法一方面在樹膠廠、紡織廠做工，一方面學習法文，由此得到讀到更多的馬克思主義及有關法國工人階級革命經驗的書籍；同時也豐富了當地的革命活動。最後她得出一個結論：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改造中國與世界」，中國必須走馬克思主義才能「改造中國與世界」，中國必須走馬克思主義才能「改造中國與世界」，中國必須走馬克思主義才能「改造中國與世界」。

二二年回國後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黨二次大會中被選為中共婦女部第一部長。她深信勞動婦女是革命動力的泉源，因此她常常混在婦女勞工及農婦中革命宣傳及鼓動，藉此把婦女勞動者從封建傳統的恩賜中解放出來。她曾於二四年領導上海絲織、烟廠等

大規模的女工同盟罷工，並負責成立「婦女解放協會」，把女工、農婦、革命知識婦女組織起來，與資本家老板們鬥爭。

向氏在上海時，經常到附近的紗廠和絲廠，因為那裡是女工集中的地區，她不懈地向婦女勞動者解釋老板剝削她們的實面目，並開辦工人夜校、平民夜校，向她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向她們解釋這個社會為何腐朽，並号召她們參與政治。在實際行動上，她更幫助她們組織起來向僱主要求較好的待遇。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發覺白色恐怖，到處殺共產黨員，當時向氏被派到最危險的武漢及湖北一帶工作，很多同志動她離開，但她以工作為重，堅持留下。

當情況越來越壞時，她還是拒絕逃走，終於在二八年春因被出賣而被捕，並在五一勞動節那天被判以死刑，這是反動統治者有意安排的勞動群眾示威。但如此，她對於這位共產主義者並不可怕，她在被捕赴刑場時，還在路上不斷高聲說：「我是中國共產黨員，為工農勞苦大眾的解放，不惜犧牲！」並高唱「國際歌」，跟着就倒下了。但正如她在法廷時所說：「我同妻子一個人領下，千千萬萬個向警予會站起來，你們等着吧，你們的末日就變到了！」

世界上最高

在向氏所處的時代，中國正處於歷史轉折點。「就世界政治經濟說，中國婦女運動，已有二十世紀勞動解放人政治變遷史全體轉變的時期。歷史的進程早把婦女總解放的道路，指給世界婦女了。……姊妹們！久困於奴隸生活的姊妹們！我們該怎樣完成我們這個特別使命呢？」向氏以解放全中國人民——特別是勞動婦女——為己任，不斷以理論及行動來教育勞動婦女，鼓勵她們團結起來反抗那群無恥的資本家。她具體地為革命婦女提出一條能達到解放的道路：「你們無錢無勢，只有團結奮鬥是唯一的武器。」「要免除軍閥和外力的壓迫，只有人民本身團結的力量。要免除廠主的虐待和剝削，也只有勞工本身團結的力量。」以此鼓動她們的戰鬥力。以下就其政治主要略述一下：

(一) 勞動婦女為「半個」革命動力——勞動婦女所受到的壓迫是任何誰都無可比擬的。在家作為丈夫的生育和地盤工具，並要做無價的家務及照顧兒女等雜作；在工廠則受着老板剝削的剝削——長時間做工，低微的工資，使工人易於生病甚至死亡的惡劣工作環境，無理的督催、扣薪等使到婦女勞工忍無可忍，必須以示威、抗議、遊行、靜坐、罷工或絕食等途徑作出反抗。她們同時提出合理的要求，如加薪、減工時等等，但他們的行動有成效也有失敗。現略舉二二年中國勞動婦女罷工運動的幾個例子以之證明：四月，上海日華紗廠女工三千八百人聯合要求加薪得以勝利。八月，上海四十四家絲織的三萬餘工人要求廠主承認女子工業進德會、增加工資及減少工時，但得勝後，大多數女工不能堅持以致完全失敗。十月，上海日商大原紗廠全體工人要求廠主承認工會，得到勝利。十一月，上海日華紗廠全體女工要求重開被資方封閉的紡織工會，後因不能堅持而失敗。同月，湖北英美香煙廠三千餘女工要求承認工會並增加工資，得到勝利。十二月，湖北英美香煙廠三千餘女工要求承認工會履行條件，得到完全勝利。是否團產主要成敗的原因何在呢？就在於婦女的力量是與男工結一致，共同進退。另外，便要求能實現，處要與男工的力量結合起來，因為男工就是革命動力的「另

一半」；若男女工的力量聯合起來進行鬥爭，那麼勝利就在工人手中了。

(二) 勞動婦女必須自覺地組織起來——中國婦女傳統的傳統角色，即處於男性之下，應該拋棄了，但如何拋棄？必須以婦女自覺地組織起來的獨立團體，向不平等制度挑戰，好讓反動統治者在驚恐之餘不得不承認婦女不是天生的奴隸。因為你們有了團體，勢力才能集中。你們全體加入，團體才能有偉大的力量。一切行動聽團體指揮才能有萬眾一心，不亂，在戰爭秩序之中，達到最後勝利。

(三) 女權運動是民權運動的一部份——「現在全世界奴隸地位的兩性人口總在人類全數的五分之四上。所以勞動解放、民族解放、婦女解放的呼聲，傳遍全球，歷史的進程，業已踏上人類總解放的時期，這是吾人所處時代的符號。」當時整個中國陷於受壓迫的境地，民族解放十分迫切，女權運動也隨而興起。她們提出的是：參政權、財產繼承權、職業與工資平等權、婚姻自由權及享有平等權等等，但這些要求是每一個公民都應該享有的，也不是婦女，在門外漢中大家的敵人那裏三項——即軍閥、資本家及帝國主義列強。所以女權運動是婦女的人權運動，也是婦女的民權運動。所以女權必須尋求到全體一律爭取，脫離後者企圖爭取前否沒有前途的。

「政治的關心」的一群，統治者有恩利等大多數婦女受教育的機會，使她們成為次等公民，永遠居於男子之下受勞役，對於「本身貧賤而有關的婦女問題、社會問題、國家問題」頗得莫不關心。「這是環境使然，也是沒有得着良好指導的緣故。」所以對婦女勞動者進行正確的教育是十分迫切的，必須為她們指出解放的道路，向氏認為能辦「有聲有色且以鼓動全體婦女黑雲」的婦女刊物是很必要的，以「使她們常常與政治的、社會的真相相接觸，以養成其「政治常識」和「社會的關心」。

(五) 只是女權及女子參政運動是沒有前途的——雖然這個運動也十分運動，但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成功。向氏以十分粗獷的語氣責備那些自以為已經爭取到真正男女平等的無知的上層知識婦女，她們以為得反對政府勉強承認的議員席位就向廣大婦女宣傳女工的地位已提升並與男子同等。但這只是增添了一些女官官僚了。她們以後就坐在那個官位上給其他婦女官僚說「好聽的大喊一聲，開幾句開話式的婦女大會，終日扮得「仙化人」般跟着體面的丈夫出席大小宴會、打打牌裝裝臉已足了，她們也不過是丈夫的「專門生福器和裝飾品」罷了，政治討論她們的禁區。她們生活在如此「上流」的社會又怎會了解勞動婦女的非人生活呢！她們的夢寐也只是逢場作樂罷了，遇有困難不能解決就逃之夭夭，連會也不赴。她們所領導的「群眾運動」從來不過幾十人是很容易理解的，從她們階級那富裕的地位所提出的要求遠不能達到解放勞動婦女的地步。她們不明白：「有窮無所歸工販賣力的勞動婦女，她們為爭自由而本身利益益以幾千幾百的群眾——至少也有幾百——用工廠的手段一致與資本家較量作戰，忽軌快線，犧牲工齡或被革除都在所不惜。這支勇敢戰鬥有組織而能戰爭的新興婦女勞動軍，不獨是婦女解放的先鋒，而且是反抗外國掠奪者的國民革命之前衛！」所以真正覺悟的中國婦女，必然是一面參加改革政治運動，一面參加婦女解放運動。」而這群「知識婦女」只會那與勞動婦女「的低下」，以示自己的「高貴」，試問又怎能向前進呢！

務，無可避免會與社會主義革命相結合。

這就得出結論：領導着造反革命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財產、保障被壓迫民族的自決權利、農民生產的集體化、和在社會主義民主架構的統籌下建立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的壟斷。這些成果將會使經濟得到最快的發展，並且提高消費和文化的水平、克服不平等、爭取婦女和在各個水平上擴大工人、逐步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距、根絕社會生活上的異化、以及消除今天講了很多但做得太少的貧國與富國之間的高鴻。

祇有一條道路可以達到這些為人們所渴望的目標：在高度發展了生產力的最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內建立起工人政權，推進世界革命。

結合的革命

其次，爭取資產階級民主的權利，以及為工人政權而鬥爭，前者屬於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後者屬於資本主義的沒落時期，都必須依靠工人和農民的同盟，向民族資產階級、前資本主義方式的剝削者和外國帝國主義者之間並不神聖的同盟之政權和財產進行拼命的鬥爭。

這兩項工作在時空上是不能分離的；隨着革命之深化，其中一項結合起另一項。歷史上的兩個對立物被辯證地溶合起來。這種對於革命進程的觀念，以及從此而引出在沙俄時期提出的社會主義策略，在一九一七年受到了考驗；它是托洛茨基在一九〇六年提出的，而在其一九〇四年的著作中亦有論述出來。列寧在「論對俄國的策略問題」中，曾對這一個問題作過極詳盡的論述。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南斯拉夫、中國、古巴和越南革命的進程和結果，正地面地顯示了這個基本觀念的正確性。在今天的伊朗和危地馬拉，它又再次受到考驗。

由於一些殖民地的人民沒有使他們爭取民族主權的鬥爭結合起向資本家的財產和權力進攻，並且從中取得勝利，從而從反面上肯定了這個觀念的正確；在這種情況下，民族的鬥爭既未能建立起穩定而持久的民主政權，又未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桎梏。我們可以引以證明伊朗的一九〇六年和一九四五至五三年的革命過程；又可引證拉達大陸上的經驗——由墨西哥至阿根廷至智利。

除了指出奪取政權和擺脫帝國主義的道路外，不斷革命論還包括了另外兩個觀念。其中一個論斷說，儘管革命力量不等待其他國家可以在一個落後後國取得勝利，如一九一七至一八年時的俄國，一九五九至六〇年時的古巴，但革命的進程却不能被限於一個國家的疆界以內。除非地球上最工業化的地帶不能實現它的基本目標，也不能在社會主義秩序下完成它的全部願望。這種革命的國際主義立場和展望，與它的全部願望。這種革命的國際主義立場和展望，與它的全部願望。

不斷革命論更強調指出，對資本主義的鎮壓並不是第一次過渡，也不是完全地根絕過去的一切關係和制度。它祇是推翻了資產階級專政所倚靠的經濟、政治和法律基礎。工農革命在取得政權之後，有責任去依照條件的許可盡快去處理和清除過去遺留下來的殘餘。這是問題的癥結。經驗會顯示出，說明這一點是比這更困難的。尤其被帝國主義所包圍的貧窮落後完成它較容易得，而其被帝國主義至今還沒有發生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

在討論不斷革命論的主要論題時，我提到了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的第二項貢獻：不平衡發展法和結合發展法則。這種並非並列的，因為不斷革命論正是這條更普遍的規律的一個特殊的表現方式。不斷革命論限於針對從資本主義制度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條件和問題；而另一法則具有更廣泛的應用，廣至人類演變的全部時期，事實上，托洛茨基是在提出了這個更廣闊的觀念以後，才自覺地發展出更廣泛的不平衡發展和結合發展法則的，他並以此來作為不斷革命論的概括。若要研究托洛茨基在這方面的思想發展階段，可以參閱他的兩本書：一九〇六年寫的「回顧與前瞻」，以及三十年代初寫的巨著「俄國革命史」第一章（註五）。

不平衡發展

這條法則的出發點，是對歷史的進程和社會生活的實際觀察，從中看到它們不是均衡而對稱的，而是每一步都顯示出各種各樣的極端不齊一。這種不齊一性的一個最顯然的例子，便是北美洲的原始居民被迫面對來自歐洲的白人侵略者。

在這件事例中，兩種完全分離的社會演變道路，是差不多三千年來在新舊世界獨立發展的產物。却相遇起來，並且互相搏鬥。這些生活在石器時代階級出現之前的部落狀況下的人民，與經已掌握了所有階級社會的知識——從私有制到軍火——的新來者衝突起來。我們知道這場衝突是從血胤種族滅絕收場的。

不單可以在生活在不同發展階段內的人民之間找到發展上的巨大差異，而且在特定的社會和民族間也如此。例如，美國工人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但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却仍然停留在最低的政治意識和組織的階段上。在各大工業國家之中，它們是至今唯一仍然未創制於資產階級政黨的羣眾政治組織——不論是工黨式的、社會民主派的、斯大林派式的、或革命的一一之工人階級。

而且，它仍然服從着資產階級統治者；而就在距離非羅列達州九十哩外邊較為窮小的古巴工人階級，就經已擺脫在它們國土上的沉重負擔。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它的本質便成了各種經濟不平等；工業與農業發展的不平衡、殖民地半殖民地對最初工業化的國家之依賴、各國產業部門之間、不同國家之間、以至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

我經已指出到二十世紀為止的資本主義文明之不平衡發展所積累起的不齊一性，已使世界歷史進入一個新的轉捩階段；在這個階段裏，資產階級勢力已變成為反革命，而它的對立者工人階級就必須担起資產階級以前所承當的進步作用。

形成歷史和社會生活中的各個因素之不同發展速度的背後原因，便是生產力之較快或較慢之發展。因此而形成經濟力量之差異，影響到不同民族、不同社會部門、不同階級、不同社會架構和不同文化領域的各種發展速度和發展範圍。

但，不平衡性亦祇不過是一個整個過程的開始部份。社會的各個部門和社會生活的不同因素之間的不均等發展，產生了一種十分重要的後果。屬於較前發展階段的特徵，與屬於較後發展階段的特徵之接觸和同時存在，做成了一種可能性，使屬於兩個階段的因素以一種結合的形式揉合起來。這些混合物從正當的種類中產生出來，而且由於它們高度的矛盾性質，遂表現出顯著的特性。

一個社會/經濟秩序的時期過渡到另一個較高的時期，就特別地溶合了新與舊的秩序。由前資本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世界制度是如此；從目前以資本主義為主時期改變為後資本主義關係就更加如是。資本主義並非從虛無飄渺中發展出來的，而是與前資本主義並非從虛無飄渺中發展出來的，而是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從部落制到封建制）有着連綿不分割的相互關係中上升、擴大而成為全球主宰的。這種歷史發展的不同特徵之揉合，產生了一種獨特



托洛茨基

我在「簡明歷史」論文集內提到其中一些美國的經驗。在殖民時期的卡羅納州內，有一間皇家大公司工作的資本主義股份企業，企圖建立純粹的封建關係，而那時封建制在美國已大部份過時了；那個計劃並沒有實現。後來，在同一地區，又出現一種資產階級的奴隸制——擁有奴隸的（原始）共產主義印第安人在資本主義市場上出售他們的產品，這樣就將三種不同的發展階段結合了。我們亦曾經看到一個二十世紀末的總統祈求一個中世紀的上帝庇護頭腦在印支的戰爭，讓它向婦女和孩童投擲燃燒彈；中世紀的迷信連結起帝國主義的暴力了。

這條法則使我們可以解釋現代革命的複雜而非常之所在；這些革命必須在不利條件下，將衰敗的資產階級時代所留下來的民主任務結合起現代科技和文化所必須進行的社會主義任務一起解決。因此，為了從美帝國主義控制下取得民族獨立，古巴就必須打碎資本主義，並且走上朝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當我們分析這些後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和它們的退步——特徵時，是應該記着加諸於它們上面的雙重歷史任務的。

而結合發展律的概念使我們可以預測這種可能性：美國工人在將來會迅速地克服他們的政治和思想的落後性，塑造出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羣眾黨，並且在一場龐大的羣眾激進化過程中將一個有力的馬克思主義先鋒隊推向頭顱——甚或在發展步伐方面，超過西方工業國家內政治上較先進的工人階級。

× × ×

斯大林主義的根源

托洛茨基對具有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突出的貢獻，便是對蘇聯的政治壟斷、對官僚階層之上升至頂點、以及對斯大林主義之根源、特性和治獄方法的解釋。對列寧死後蘇聯（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加速出現的恐怖現象，目前流行着幾種理論。最普遍的錯誤觀念，便是指斯大林主義是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天然結果和不可避免的延續。其他的理論則界定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

× × ×

集產主義，被一個新的剝削階級所控制。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毫無批評頭腦的克里姆林宮隨從者却相信斯大林所宣稱的蘇聯已經社會主義；而且還相信赫魯曉夫和布爾茲尼夫所宣稱的，蘇聯正在走向共產主義。

托洛次基對斯大林化的蘇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分析和評價。他界定它是一個墮落了工人國家。他解釋說，與馬克思預測的不同，無產階級在落後的俄國而不是在西歐較先進的國家首先取得政權；這是由於一場反對沙皇政制和地主的農民起義結合在一場反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這場結合的革軍派補造成了革命的例外龐大規模；因此它實行了改變現代歷史方向的大躍進。

可是，列寧在一九二四年死後所開啓的俄國革命第二階段裏面，那在較早前推使俄國人民比世界上其他人走得更多的傳統經濟和文化落後性動力，現在却復活了。它成了官僚反動的基礎和出發點，結果完成了一場政治反革命。蘇維埃共和國初期的工人民主被粉碎了，代之以斯大林一人統治為首的專制獨裁。

這次倒退是兩個主要因素的結果：其中一個因素是內部的，另一個是國際的；第一，革命沒有擴展到成為工業化的國家內，諸如德國；而第二個反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僅長期孤立，而且還被帝國主義帝國緊密地圍堵。第二，蘇聯工業的貧弱生產力——再加上第一次大戰和內戰的摧毀性打擊——造成了極度的貧困、悲苦和社會不平等，這助長了一個新階級階級的興起和鞏固。在社會意識上統治着的新階級被降為一個被壓迫的階級；雖然，由於存在的後資本主義財產形式仍是符合工人的歷史利益的；工人階級仍是統治的階級。

工人民主的消失

在資本主義裏面，祇有在較富有的國家才建立起較高的民主；而在較貧窮的國家的國家，祇有在它們從來未能十分強健和穩定。

同樣的規則亦可應用於蘇聯和其他以後以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為基礎的國家。國家越貧窮落後，官僚主義和不平等的傾向就越強大，就越有可能讓工人國家內在物質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享有特權的份子和反民主力量變成這種形勢下的主人，損害勞動羣眾的權利和權力。

下面的一個類比可能對理解問題會有所幫助。倘若一個兒童缺乏正常體態、合格器官和健康的特徵所有的食物吃，那她或他由於營養不良就會患上軟骨病、矮小、脊骨彎曲和笨拙的腦袋。這種生長的規則同樣適用於社會組織和它們的政治制度。

托洛次基解釋說，蘇維埃共和國成為極惡劣環境的一個受害者，因為它的社會和國家在成立的最初幾年被剝奪了正常發展所需要的條件和因素。因此而出現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現代歷史上最自相對立的結合產物。它的基礎是最先進的後資本主義性質的財產形式和社會成果（它的國有化生產、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壟斷）。這些都是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質產物。

但在這個經濟基礎的上面，是一個完全專制的政治上層建築；它重新設立階級統治表面的一些假壓迫的形式。人們對此感到迷惑，並不理解它，也不能對它作出估計，因為今天的蘇聯正充塞着各種各樣的矛盾。

在這個工人國家裡面，工人本身對重大的決定並沒有直接的政治發言權。發表意見和組織的自由受到嚴格的限制。它在生的最後偉大作家蘇菲尼律的作品不准出版。在交通運輸方面，巨大的噴射飛機橫越過無人耕種的曠野，在那裏農民的木頭車像幾個世紀以來那樣在崎嶇的小路上拖動，而蘇聯的太空人却正圍繞着地球飛行。巨大的科學、技術、工業和文化的進展伴隨着政治的倒退和反動。

保衛工人國家

托洛次基說，這個政權的官員宣稱它代表社會主義，這是騙人的。蘇聯儘管有很多成就，但仍遠不是社會主義。它是一個後資本主義過度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存在着被緊張矛盾所破壞的不平衡和不和諧的結



「俄國人是歐洲的黑人。」

構，其中第一點便是篡奪了政權的官僚階層與工人羣眾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所有社會主義者都要毫不妥協地支持黑人的解放鬥爭。他們要與工人階級和有色人種工人階級站在一起，反對任何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企圖。

人階級爭取的成果來保衛。經已建立起來的財產關係是蘇聯工人唯一的一條前進道路。正是為了這種財產形式，而不是因為獨裁的政制，造成了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的敵對。

從這個診斷得出什麼結論呢？為了走向社會主義就要清除道路，蘇聯的工人將要反對和掃除官僚特權階級。托洛次基預示說，祇有以政治革命的較高形式才能做到這一點。反官僚革命的目標是將對經濟和國家的監督交回直接生產者手裏，從而讓他們能夠前進並建立起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裏面、和馬克思主義綱領內曾許諾的社會主義民主。

斯大林死後的若干發展經已證明了在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和衛星國內，以及在一個共產黨內，反對它的專斷控制的反對派之出現是不能被阻止的。提出如下的例子便已足夠了：儘管在一九六八年被蘇軍「碾碎」捷克斯拉夫人民想建立「具有人類面貌的社會主義」；波蘭工人前進進行了一次較成功的進取，推翻了窩卡，直到今天還在抗拒着；反對派知識份子和被壓迫少數民族的繼續反抗；以及歐洲共產主義政黨溫和地提出來的異端。

這些事變有助於支持托洛次基的論點，他認為那些寄生的官僚階級並非後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有機部份和不可避免的產物，而是第一個工人國家因國際孤立、漫長的貧困和不平等所產生出來的巨大毒瘤。它是一個過渡的現象；新的革命發展會削弱、反對和最後克服它，尤其是當工人在一個或多個工業先進國內取得政權之後。

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托洛次基曾經分析很多個國家的事變和發展。他對黑人民族主義和美洲非洲人自決的觀點，是一種先見之明，澄清了美國政治裏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黑人鬥爭

他指出美洲非洲人構成了一個獨特的被壓迫少數民族。因此，他們擁有自決的權利。他們會越來越不需要斷資本主義加諸於他們的、不會修正的歧視。黑人工人會比大部份白人工人更先激進化，走向站在反工人階級力量大前隊，並且比那些工人階級中較特權資本主義力量大前隊，並且比那些工人階級中較特權的部份更堅決地為建立一個新的社會而戰鬥。他說：

「俄國人是歐洲的黑人。」

所有社會主義者都要毫不妥協地支持黑人的解放鬥爭。他們要與工人階級和有色人種工人階級站在一起，反對任何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企圖。

在這些基礎上，在我們的社會主義主義——社會主義工人黨，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1 除了美國土著、墨西哥族人和波多黎各人以外，黑人是最少享受到美國文明的好處和權利的，但他們的勞動却對這個國家的財富和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越來越多的反對這種世紀不公義，推動了一九五五至五六百以來的羣眾抗議運動。

2 數百萬的黑人具有兩重的社會/經濟身份。他們是爭取解放和主要被壓迫民族。他們再也不是分散的農村農業勞動者，而絕大部份是城市無產階級。他們集中在全國的主要工業中心，聚居於黑人區內，在重工業和服務性行業中工作，佔經濟和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

3 他們的爭取平等和解放途具有雙重的性質。它們一方面是爭取自決權的民族民主鬥爭，爭取作為一個民族對自身命運的權利；而同時，它們是一個走向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方向的工人階級運動，即使他們的參加者和領導在某一時刻並不明白這一點。未來的美國黑人革命運動將帶有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性質。這是有利於對壓迫和剝削採取社會主義道路的極之有力結合因素。

4 那些未能掌握黑人解放運動和其動力之結合性質的人，會很容易在理論和實踐上走上歧路。他們會採取一個片面性的兩種對立形式。有些社會主義者們將視黑人解放運動的種族部份。將它看成為僅僅是老聞和種族鬥爭之間階級鬥爭的一部份。在另一邊會有一些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他們將黑人運動看成為基本上是文化上的和社會的；在裏面，無產階級的基礎和聯繫算不了什麼；反資本主義的動力也不會改變它的命運。

正確地應用不平衡發展和結合發展原則，以及正確地應用托洛次基的不斷革命理論於黑人問題的基本問題和前途上，就可以避免這兩種錯誤。這些較為廣泛的總結並非空想的抽象物；它們與理解最關鍵的當代問題有直接的關連。

最後，我想研究托洛次基的第五項貢獻；有些人對這一點是忽視的，但托洛次基本人却認為是他最後一次流亡時期內最重要的觀念。那就是他在觀念上對工人階級革命階級主義的性質和角色的演變。他對這個問題的觀念曾經歷過重大的變化。它們可分為兩個明

願不同的時期，第一個為一九一七年之前，第二個為一九一七年以後。轉折點剛好是那革命事變的關鍵性一年。

一九〇一年托洛次基從西伯利亞逃脫流放之後，便被列寧邀請至倫敦，成為「火星報」周圍的一羣馬克思主義宣傳家的一個。當不久之後俄國社會民主黨發生了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的分裂時，托洛次基與孟什維克站在一起，但不久便與他們分手了。在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七年間，他站在兩個敵對派別之間的一個獨立的位置上，多次不成功地向他們求和與統一。

他反對列寧革命的、一個集中化無產階級先鋒黨的原本觀念，一如今天的很多新左派和反列寧主義者那樣。他後來寫道：「在那時，我沒有完全認識到，在一場反對舊秩序的戰爭中，革命政黨若要領導數百萬的人民，就需要一種緊密而強烈的集中主義。」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制之後，托洛次基便決定性地改變了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在七月，當布爾什維克黨受迫害，而列寧和李洛維也夫發難起來的時候，他領導其彼得格勒小組與布爾什維克黨統一。

十月革命的勝利可以追溯到兩個條件。在使黨重新武器和再擬定方向的四月提綱（註六）裏面，列寧接受了托洛次基不斷革命論的戰略性結論——為了實現單黨運動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目標，無產階級那時必須奪取政權。差不多同一時候，托洛次基接受了列寧的托洛次基主義者，而托洛次基成為列寧主義者。

這種在個人和思想中的共同發展，是十月時成功地奪取政權的基本前提。十月暴動之後，當托洛次基放棄了與孟什維克作任何組織妥協的想法之後，列寧這樣評論他道：「現在再沒有比他更好的布爾什維克了。」

而且，從那時起，托洛次基再沒有對列寧的組織原則產生過動搖，事實上，在列寧一九二四年死後，他成為這項原則的嚴峻決保衛者。

對於列寧主義說黨生活理論所提出來的民主集中制之意義和內容，存在着普遍的誤解。

混亂的主要根源，是斯大林主義將列寧主義觀念和實踐加以扭曲後，將它帶進工人運動而去的。斯大林主義的官員從上而下地獨斷地操縱着黨，其實是真正的列寧組織制度的對立物。與官僚集中制不同，在民主集中制之下，領導和領導機構要向黨的基層負責，並受它的控制，而且服從於民主的決定；一如第四國際的各國支部那樣。

托洛次基一方面反對斯大林派模式的集中制中制，也排斥自發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在原則上反對集中制，他強調要有一個在內部生活上民主、在行動上集中的工人政黨。

在第四國際的成立文件「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和第四國際的任務」（通常叫作「過渡綱領」）內，托洛次基指出，由於第二和第三國際的墜落，和由於較先進的組織之錯誤，世界政治形勢的特點，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歷史性危機。這種人類危機祇有靠建立一個新的革命先鋒隊才可以解決。

他簡要地寫道：第四國際的任務，便是「消滅資本主義的統治。它的目的——社會主義。它的方法——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內部的民主——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沒有紀律——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第四國際的內部結構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則為基礎的；在討論上充份自由，在行動上完全一致。」

新的革命國際

托洛次基將他生命的晚年貢獻給在國際平面上形成這樣的黨和培養一羣幹部。他認為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比一九一七年更認為，比內戰時期或其他時刻都更重要。」這並非他言過其實：傳其他



托洛次基(漫畫) Denia作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明白到理論若沒有溶入實踐之中，若沒有在日後的階級鬥爭中受得起考驗，若不能連結起建立社會主義革命者的一個世界性組織和各國政黨，則理論是無能的。他是一個能動的人，不是一個坐在安樂椅上的理論家。在寫作和思想時，他經常都想到一個目標：改變資本主義社會，而不僅是對一場上演的戲劇發表評論，對其他人的表演作悲歌或鼓掌。

第四國際的成員就是在這種傳統下培養起來的，並且將它推前一步，在全世界建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而這並不是沒有成績的。

X X X

托洛次基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如他們的兩個代表人物——是兩種不可調和的勢力、政綱和組織的方法。克里姆林宮的獨裁者和其繼承人代表了官僚階級的利益和他們狹窄的民族主義世界觀；這班官僚在第一個後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實驗中得已墮斷了權力，並累積起特權。而他的死對頭之支持者，却是代表了一個世界工人階級的利益，努力去推翻資本主義和設立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

在斯大林掌權的四份之一世紀裏面，他的說話便是世界各國官方共產黨的法律；他的謊說被印成數百萬冊，並且被視為聖旨。而托洛次基，這個被迫害的亡命者，却連發表意見也有困難，祇能在一個有限的圈子內流傳他的見解。斯大林主義運動的成員將他的著作看成為禁忌；他們能夠看到的祇是他那些經已扭曲和醜化的意見。

托洛次基勝過斯大林

歷史有其無情的反覆。在今天蘇聯，斯大林被他最親密的戰友揭露，並被視為一個罪惡的暴君。他的

著作不再大量印刷——事實上很難找到；而他那些無所不在的畫像已在所有的政府辦公室被除下。他的百年壽辰是否得到莫斯科重視，仍是一個疑問。

在另一方面，托洛次基的書籍正以幾種語言出版。每年都有十數種他的著作出現。他的思想在各國都越來越爭取到更多的聽眾和更廣泛的支持者。

不久之前，捷克的胡錫克政府將十九名青年入審判，指他們具有托派思想，其實是對付他們之反對政府壓迫。托派後裔，烏拉（PETER UHL）剛被判以五年監禁。

新成立的第四國際伊爾支部已露出頭來，成為社會主義政權的掌旗者，反對霍梅尼/並尼沙德的教會政權/資產階級；這個政權正企圖奪回伊爾軍乘在推翻伊爾皇的戰鬥中所取得的勝利。

雖然斯大林的兇手四十年前在墨西哥擊斃了托洛次基，但他並不能謀殺托洛次基的思想——斯大林的學生就更加做不到了。

我相信，任何一個政治上有認識的人，或者假若我們想理解今日世界政治的本質，是不可能不去認識這個科學社會主義的才底思想；他留給我們那樣豐富的財產。

我希望這篇關於托洛次基底成就的總結性文章能夠引起你進一步去閱讀他的大量著作；而更加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也實踐他的例子，成為第四國際和其各國支部的一部份，參加爭取建立社會主義的運動。

〔本文作者喬治·勞埃克（GEORGE NOVACK）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美國托洛次基主義組織「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一名領袖，並且是英文理論月刊「國際主義評論」編輯部的一員。〕

〔勞埃克曾經見過托洛次基，當時他正在幫助組織一個「調查對托洛次基性罪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以哲學家和教育家杜威為首；它證明在一九三七年對托洛次基的審判中對托洛次基的控罪完全是一項誣構。〕

〔勞埃克有很多著作，解釋、保衛和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其中包括有「簡明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爭論」、「民主與革命」、「馬克思主義邏輯學」和「社會主義的人文主義」等。若想購買這些英文書，可與本報社聯絡。〕

一：布爾什維克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列寧所領導的一個派別，意即「多數派」，與它對立的是少數派「孟什維克」。派別於一九〇三年形成的初期是圍繞着組織問題，但很快便發展至對俄國革命基本問題的對立，於一九一二年正式分裂為兩個政黨。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改名為蘇聯共產黨。

二：本刊即刊登這篇文章，題為「俄國革命小史」。

三：即「文學與革命」，寫於一九二三至二四年間，中文由「春燕出版社」出版。

四：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爆發了革命，推翻了沙皇專制，成立了臨時政府，以克倫斯基為首。八個月之後，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農、兵代表大會（蘇維埃）將它推翻，建立了工農政府。

五：「回顧與前瞻」曾在四十年代譯為中文出版，但至今未有重印。「俄國革命史」即轉印成第三版。

六：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從瑞士回到革命高漲的俄國，隨即提出了「四月提綱」，反對當時黨內多數派支持臨時政府和在大戰中保衛祖國的立場，主張應準備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列寧這一個新立場將布爾什維克黨重新組織。可參閱列寧選舉第三卷十三至十八頁或全集第四卷一至六頁。此外還可參考「十月政變」附錄「三種俄國革命觀」，中文版由十月書店出版，第六十五頁。

